

## ■新作聚焦 葛亮长篇小说《北鸢》:

## 民国气度里的丰盛与辽阔

□曹 霞

葛亮要做的是对一个逝去时代的风华和文化细作检点,对隐藏于民间的侠义、诚信、忠诚、宽厚、仁爱等传统精神细作描摩,在时间的流淌里校阅那些未曾消逝的善好记忆。

从纸面上的“北鸢”到现实中的“风筝”,一虚一实,一雅一俗,都暗合着风雨飘摇的家国图景。在大时代中身不由己、生死未卜的人们,都像风筝一样飘浮于天空。这种徘徊于虚实之间、明暗之间、生死之间的辩证法,为《北鸢》带来了普遍性,也带来了复杂性。

在2009年的长篇小说《朱雀》中,葛亮以对南京古韵的复现和20世纪宏阔历史中人的命运的讲述,开启了他的“中国三部曲”。今年出版的《北鸢》为三部曲之二,叙事格局与《朱雀》有所不同。作家将地域从“实存”转为“虚构”,设置了位于中国南北之间的襄城,将人物谱系集中于商贾世家卢家和没落士绅家族冯家,通过两个大家族在历史沧桑中的跌宕起伏,涵纳他对于民国人物和家族士子的遥想与追忆。

《北鸢》从1926年写至1947年,以卢氏昭如收养文笙始,以卢文笙和冯仁桢收养故人之子终,这开篇和收束,无论是在时间节点还是叙事逻辑上,都与传统的“政治史”、“革命史”大相径庭。小说中关于蒋政权的历史书写付之阙如,关于北洋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政治事件的书写也并不占绝对比例,且多采取侧写和暗示方式,种种设置中暗藏着葛亮对于历史逻辑的别样考量。陈思和称《北鸢》以“半部民国史”为背景,是颇有道理的。

葛亮志不在“政治”与“革命”,也无心探索国族话语与党派之争的来龙去脉。那些宏大伟丽的叙事话语,或是听起来颇具迷惑性的政治概念术语之类,完全不能对他构成威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能写什么,也知道自己不写什么,因此笔触不会偏离或漫溢。他要做的是对一个逝去时代的风华和文化细作检点,对隐藏于民间的侠义、诚信、忠诚、宽厚、仁爱等传统精神细作描摹,在时间的流淌里校阅那些未曾消逝的善好记忆。这听起来相当“过时”和“老土”,却恰恰是葛亮视若珍宝的东西。他坚定地、清醒地、因此也必然是孤独地持有着属于他的确信:他相信就在并不遥远的百年之前,在兵荒马乱和暗无天日的生活表象下,有过一个眉目清明、朴素无华同时又气象万千的“中国”。生活于彼时彼地的人们,即使遭受着战乱、贫穷、戕害与外寇的侮辱,也自有一份高蹈、高贵的光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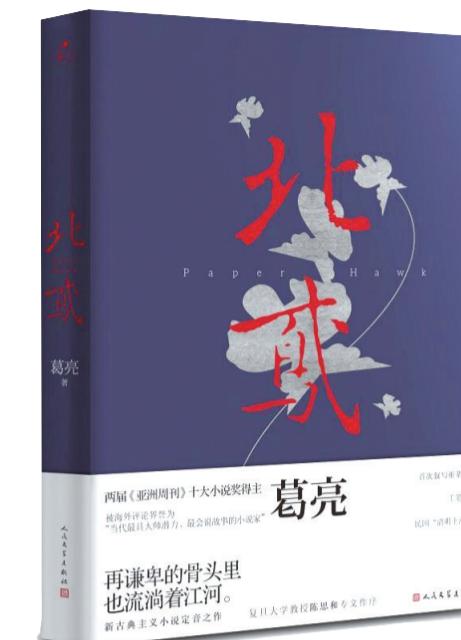
这种确信与追慕主要集中在卢家。卢氏昭如姓孟,为亚圣孟轲的后裔,却在民国时代走向没落,家族恪守的伦理规范也沦为笑谈甚至自嘲。大姐昭德嫁给军阀石玉璞,在丈夫于军阀混争中被害后而疯癫;哥哥盛淳在投靠之人失势后不得已做了寓公,颓唐度日;昭如嫁至社会地位不高的商贾之家,却因天性的宽厚、仁义、不

计较而与丈夫卢家睦平和度日。在夫家生意受到时代政治波动和外来资本入侵而面临危机时,她的仁厚天真、无心机、不算计为一家人赢得了生存的空间。倘若将昭德、盛淳和昭如一比较,便可看出,葛亮对传统伦理的理解自有其心。他在命运的起落沉浮间赋予昭如以普通人、寻常人的安宁,便是最大的“信”。

这“信”是有难度的。信现世、信实利很容易,但是,信情义、忠贞、承诺,这是多么“虚无”,多么地无着无落,聪明的作家通常会避开这种“虚无”,以寻求“实有”的庇护。葛亮却像昭如一般地“颠倒”,他笃定了这份确信,知道它是恒常、有效的,知道它的延续与弥漫自有其去处,比如以商贾身份行名士气度的卢家睦。卢家睦出场不多,却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承载者与传递者。他与妻子昭如同持仁厚之心,视文笙如同己出。在生意场上,他秉持仁义诚信的信条,忠善行事,全力担当。对于弱者,他不仅在经济上匡扶相助,更重要的是他并不自居其上,而是以充满人情味的“交换条件”平等相待,令其不失尊严和体面。做风筝的四声坊龙师傅初到襄城,举步维艰。卢家睦慷慨解囊,只有一个要求,每逢儿子文笙的本命年,龙师傅专为他扎一只虎头风筝。互换的条件从他们这一辈开始代代延续。在《北鸢》中,这种家族仁厚气息的互相濡染、平民百姓的彼此善待、大时代“变故”中“不变”的承诺与援助,是故事的支撑与主体,氤氲着朴正与善意。

和《红楼梦》《家》的家族史笔法一样,《北鸢》有“真实”,也有“虚构”。卢家与冯家生活在襄城,因政治、经济、生息、战争等原因,其轨迹不断辐射到天津、北京、杭州、四川等地。以他们为轴心,小说连结起了一幅幅危机四伏又光华暗涌的历史图景:在这里,有石玉璞、张宗昌、刘珍年(小说中的柳珍年)、张作良、陈独秀(小说中毛克俞的叔叔,葛亮的太舅公)等民国真实人物,他们或为叙事重心或惊鸿一瞥,令“民国”立现历史感与实存感。小说中也不乏虚构笔法:军阀、商贾、政客、名流、买办、英雄、草莽,在历史舞台上呼风唤雨、改朝换代;文人、名伶、乐师、画工、禅者、教士、匠人,上演着爱恨情仇的国族传奇,新旧更迭的世事迁移。

这家族传奇与民国风物搅扰在一起,如此地交相错叠,光影斑驳。然而,我们却不难体悟到大历史之下的一



份感喟与苍凉。在《红楼梦》中,一僧一道带着“美玉”来到“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开启了一部假语村言的“石头记”。在《北鸢》中,这份恍惚迷离尽现于“北鸢”。“北鸢”一语出自曹雪芹《废艺斋集稿》的《南鹞北鸢考工志》,世人相传佚失,却在小说中复现。“美玉”与“北鸢”,典故出于同一个作者,同样有着实存与虚与错杂的缥缈虚幻之感。“风筝”在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贯穿卢家精神血脉与气度的物象,多次在抗日战场上救危扶困、化险为夷。从纸面上的“北鸢”到现实中的“风筝”,一虚一实,一雅一俗,都暗合着风雨飘摇的家国图景。经历着血与火的洗劫的大时代,在大时代中身不由己、生死未卜的人们,都像风筝一样飘浮于天空,命悬一线,但这“命悬一线”,又未尝不可解释为“一线生机”,毛克俞将卢文笙的画作题目如此改过。生与死,无非是一体两面;希望与绝望,也取决于同一来路。能作如是观者,必然是对一个时代的巨变与荒凉彻然了悟,在大寂灭中看到生机,在时间的深处眺望到光亮。这种徘徊于虚实之间、明暗之间、生死之间的辩证法,为《北鸢》带来了普遍性,也带来了复杂性。

往大了说,《北鸢》关乎民国人物的气度风华;往小了说,它是在家族史中寻觅精神的流脉。这家族史是卢家的,也是葛亮的。葛亮对于宽厚温暖精神的笃信,对于民风物有温度的体悟,对于旧时人物的钦慕,都离不开家族的影响。他在《北鸢》扉页题辞将书献给祖父葛康俞教授,可见他对祖父的尊崇与敬爱。无论时局如何动荡,祖父辈不曾改变过安静淡定、谦恭自守的人生状态,这份结结实实的从容和高远也感染了葛亮,令他能够触摸到生命的元气和底气,以训练有素的文学笔法与想象力,在“时间煮海”的沸腾里,抵达那个时代的丰盛与辽阔。

## ■创作谈



□葛亮

民国民间

《北鸢》的创作缘起因我祖父遗作《据几曾看》编辑的一封信,希望我从家人的角度写一写祖父的过往。曾考虑写一部非虚构作品,通过个体的角度宕开,延伸至家族脉络,以此折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发展路径。

前面做了近三年的案头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祖父生前的好友陆续去世、凋零,这给写作展开带来阻滞,也造成感情上的撞击。亦因这段时间与祖父辈的接触,让我切实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轮廓。我问自己,单纯从非虚构的角度去写是否是合适的选择?事实上,“非虚构”有相对科学与严谨的一面,但就历史的体认、把握和再现而言,是否最为恰如其分?

一个时代,单纯以一个学者、或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为核心去勾勒,还是拘泥。理想中的切入点应该是自下而上式的。传统中国有所谓三分天下的文化建构,“庙堂”代表家国,“广场”指示知识阶层,而“民间”。民间一如小说之源,犹似田畴,不涉大雅,却生命力旺盛。《北鸢》最终选取从我外祖父的角度切入,这种角色或立场的把握与调整直接影响到写作从文体(从非虚构变成小说)到整个气质的改变。书里依然也可以看到以我祖父为原型的人物,但给读者的感觉,异于非虚构作品表达的那种质朴清冷之感,更为柔和,且具温度。

以民间的立场来看时代,维度不拘。我外公出身资本家,因幼时的经历,目睹军阀政要阶层从繁盛到衰落的过程。之后人生种种,得以举重若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来自于民间的态度。陈思和教授说过,民间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扮演包容力盛大的意象。民间视角灵活舒展。把知识分子群体放到民间更大的维度去审视,与提取出来单纯勾勒效果迥然。

1905年科举废除,“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被仓促剪断。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一系列分化。在《北鸢》中写到一个画师吴清舫,有“清隐画家”之誉。但在二次革命后,设帐教学,广纳寒士。某种意义上担当了公共知识分子之责。另一类是以我祖父为原型的毛克俞,其因青年时代的人生遭遇,特别是看到舅父(原型是陈独秀)在一系列政治选择后落幕的惨淡晚景,就此与政治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疏离感。他在学院中保持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纯粹。其最重要的作品在上世纪40年代完成,避居鹤山坪,埋头著述。我在小说里处理得更浪漫些,写他在母校杭州艺术院旁开了一个叫“苏舍”的菜馆,菜单开头写着苏子瞻的诗句“未成小隐聊中趣,可得长闲胜暂闻”,实际是半隐半士之态。此外在第二章,写到孟养辉这个人物,原型是天津的实业家孟养轩,亚圣孟子的后代,经营著名的绸庄“谦祥益”。孟养辉的姑母昭德,不屑商贾,他便回应说,所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如果有一个诗礼的主心骨,做什么都有所依据。因家国之变,我选择实业,所谓远可兼济,近可独善。

这些人有着不同的时代认知立场,处世方式各有千秋。知识分子的分化正是民国不拘一格最为明晰的表达。这是时代的包容,也是民间的包容。而我的外公,从某种意义上恰似民间的剪影。虽无峥嵘头角,却看尽他处的人间风景,在军阀家庭里成长,随母亲跑反,有过很短暂的军旅生涯,经历了诸多波折后,尘埃落定,性情一如既往的温和,回归生存本位。他是一个人,也是一代中国人,平定中和,拥有与时代和解的能力,彼此砥砺,也相互成全。

## ■评论

■新作快评 张世勤中篇小说《英雪》  
《收获》2016年第2期物哀其伤情何堪  
□仲文娜

张世勤的中篇小说《英雪》充盈着淡淡的“物哀”审美基调。动感的生活、无奈的挣扎、事理的无常、美好的碎裂,读来令人唏嘘。

小说以《英雪》为名,读者一定会以为这是一篇以英雪为主人公的小说,实际上却并非如此。小说只是以英雪的成长轨迹作为时间轴,由此勾勒出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之后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里,英雪身边几个年轻人的命运沉浮与情感轨迹。英雪个人的成长、情感的困惑、家人的窘迫生活,反而成为了辅线。

项天提前结束研究生学业,投奔在雀城经商的好友闵繁浩,经人介绍与柳如叶结婚,婚后生活稳定而平淡。他在选秀活动中认识了纳小米。

纳小米因家庭变故向闵繁浩求助,闵繁浩好心地安排她住进自己的别墅,却恰巧被一直企图敲诈勒索他的3个绑匪当做他的情妇绑架了。由此,闵繁浩被周边人安上“包养女人”的恶名,百口莫辩。事件继续发酵,导致柳如叶远

赴日本留学,两人最终离婚。生活就是这样,很多看上去合乎情理和逻辑的事情不见得就是真相,看上去的真实或许只是事情表面的真实而已。闵繁浩初入商场时被一个叫尹淑花的女人所骗,加之童年经历,已无意婚姻。但却在遇见文晴晴时改变了情感初衷。但婚后不久,他又以报复的名义爱上了新来公司工作的年轻大学生——尹淑花的女儿。闵繁浩本不是个猎艳者,却似乎依然踏入了有钱人始乱终弃的俗套。“生活的的确没有多少浪花,但你却不得不承认,它有很多旋涡。”文晴晴的野性、昧昧的浪漫,都演绎出了各不同的情感境况。

邻居家的女孩英雪初识项天时9岁,像一股清泉,干净、清爽、美丽。英雪一家四口挤在一间破旧的周转房里,父亲是锅炉工,母亲靠卑微的劳作勉强维持着生计。英雪身边的人都尽可能地给予她帮助,但仍止不住她家庭变故的一次次发生,终让她由单纯快乐变成了郁郁寡欢,以致于毕业后作为空姐飞上蓝天,也仍然感觉像浮萍一样飘着,无力承受生活与情感之重。

英雪是一个人,更是一种象征,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方“价值连城的瓷器”,但它被碰落了,就会变成一堆碎片。小说以她的名字命名,便有了提纲挈领之妙。而且,这种生活的揪心,正是文学诠释最好的起点。

## “天马行空”的同时也该“天衣无缝”

## ——读唐天马的长篇小说《哀牢深处》

□贺绍俊

唐天马的长篇小说《哀牢深处》结构宏大,讲述了云南百余年来的变迁。其中的“哀牢”是云南的一座山名,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唐纪元就是从哀牢山建功立业的,小说中他有一段表达心迹的话,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唐天马写作这部小说的表白:“这块土地需要他留守,国家需要他留守,这是他唐纪元神圣的天职。他必须下决心,把一个家族的根深深地扎进这片炽热的土地,深深地扎根于这里的人民之中,真正和他们融为一体,并连续大地,紧紧地拥抱在中华大地的怀抱。”唐天马正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写了这部小说,小说名“哀牢深处”不仅表达了他对故乡的眷念,更表达了他希望哀牢山从深处走出来,让世界看到它的风采。

从历史叙事的角度看,《哀牢深处》也许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滇南地区自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小说基本上写了以下几桩历史事件:蒙自开关、“辛亥革命”、“云南重九起义”、“蒙自兵乱”、修筑滇越铁路、一个碧石铁路、滇越铁路保卫战、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迁驻蒙自、南湖诗社、修筑蒙自军用机场、滇西松山之战等等。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讲述清楚固然不容易,更加难得的是如何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与小说情节衔接起来,让历史事件成为情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作者充分发挥小说的虚构和想象功能,将小说中的人物安排到历史的真实人物身边,将一个个互不关联的历史事件串了起来。比如滇越铁路有一座横跨大围山峡谷的五家寨人字桥,是整个铁路建设中最艰巨的工程,堪称建筑奇迹,被列入《世界名桥史》。显然,在讲述滇越铁路建设这段历史时,不应错过这座人字桥。但人字桥的设计出自一位法国工程师,是法方工程运行中的事情,如何将其转化到讲述滇南历史的中国故事之中,唐天马便做了这样的处理:他让唐志鸽作为滇越铁路建设总公司中方总经理,参与到了工程进程的每一个环节中。这就使得小说细节充满情趣,也让人字桥多了一些中国元素。

在中国文化传统的理念里,家族往往与历史相辅相成,也就是说,一个家族的兴衰,背后反映的也许就是历史的兴衰。唐天马自然也会把自己的家族放到滇南历史命运变迁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于是家族叙事与历史叙事有机地融为一体。这决定了《哀牢深处》的结构特点,它貌似一株家族之树,不断繁衍分枝。其中最为枝繁叶茂

的一代,应该是唐洪道的儿女辈:唐志鹏、唐志鸽、唐志鹃、唐志鹤、唐志鸽。他们有的从事实业,有的从军,有的留学,将唐家的精神脉络延伸到了滇南历史的方方面面,展示了一个家族伴随着社会与历史的进步走向兴盛的未来。唐天马有很浓厚的泛家族主义意识,他在题记中写道:“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牺牲之后,唐家的血脉不断;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之后,唐家的精神不灭。这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显然,唐天马看重的并不是唐家某一具体真实人物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而是将唐家作为一个整体,在国家和民族的重大事件中都应该能够看到整个家族的身影和精神。

唐天马在小说中完全虚构了唐家的一个家族的繁衍成长。唐纪元是这个家族叙事的源头,他是清朝军队的左将军,率部前往滇南平息叛乱,而后被清朝廷任命为滇南巡抚,仅用几年时间就将滇南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某年的旱灾导致各地暴乱,唐纪元断然拒绝撤退到安全地带的建议,领导迎战乱军,在战斗中牺牲了性命。历史上并不存在一个叫唐纪元的滇南巡抚,这样做是冒风险的,因为这部小说还包含着历史叙事的成分,读者自然也会以历史叙事的逻辑来对待唐纪元。所幸唐天马并没有在唐纪元这个人物上大做文章,也许他明白这一风险。

说到底,唐天马写这部小说是要释放他内心强大的英雄情结,因此无论历史叙事也好,家族叙事也好,最终都是为了让英雄叙事变得更为丰满。小说从开始讲述唐纪元的故事时就确立了英雄的基调。从小说的内核来看,唐纪元的故事可以说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楔子,它所起的作用就是为小说确定了英雄的基调。这一基调在唐纪元被封为滇南巡抚后的一个抒情性的场景中得到了明确的传达:唐纪元接受圣旨后返回兵营,思绪万千,便有了我在文章开头所引用的那一段真诚的表白。此外,唐纪元即将去迎战乱军的前夜,预感到此次战斗凶险,也许一去不复回,他在家中对儿女作了一番交代和叮咛。这番交代和叮咛也就意味着英雄的主题已由唐纪元传递到了他的下一代,真正波澜壮阔的英雄实践是由他的下一代唐洪道开始的。从英雄叙事的角度看,唐洪道是具体的实践者。而到了唐洪道的下一代,他的几个儿女们的英雄叙事,则主要是在英雄内涵的丰富性上做文章。

唐天马更钟情于军人类型的英雄,这大概与他曾经

是一名军人有关。了解到这一点后再读《哀牢深处》,不禁恍然大悟,书写这部小说不就是唐天马的一次向英雄致敬的举动吗?威廉·詹姆斯曾说过:“人类关于现实的普遍本能……始终是把这个世界从根本上当作英雄主义的舞台。”这句话似乎非常适合描述唐天马的心理状态,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商海,更不必说在文学写作中,唐天马都是将其当作英雄主义舞台来对待的。

在一个小说文本中,同时存在着三种叙事意图,每一种叙事意图都会生长出一条情节线,三条情节线交互发展,必然构成繁复叙事——这无疑也对小说的叙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首先要做到价值观与历史观的协调和平衡。家族叙事基本上是从价值观出发的,而历史叙事则主要是从历史观出发的。面对具体复杂的人和事件时,一个人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可能会发生冲突,总体来看,唐天马做到了二者的协调和平衡。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是一个难处理的历史结点,唐天马在处理这一时间节点时做得比较成功,小说中,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唐志鸽希望全家人都和他一起移居香港或海外,全家人都等着长辈唐洪道作出最终的抉择。唐洪道认为唐志鸽等人应该离开,而他和另外几个儿女则应该留下。也就是说,在唐天马的笔下,不同人物的不同选择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他没有简单地用惟一的政治标准对历史作出评判。

其次是如何处理好真实与虚构的衔接问题。历史叙事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唐天马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必须将虚构的家族叙事嵌入到真实的历史叙事中,否则二者无法交集。在这里,唐天马基本上采取的是寻找缝隙的方法。人们所讲述的历史真实不可能是真实的全息影像,会留下一些缝隙,或者说一些空白,将虚构嵌入到这样的缝隙或空白处,就会比较妥帖。比如写蒙自叛乱,虽然从头至尾都有唐志鸽的身影,但他基本上处在缝隙间,并不影响历史的真实性。

唐天马的创作的确有一点天马行空的味道,他并不在意已有的规范和被大家所认可的路径,因此也就有了《哀牢深处》这样的三种叙事并置的叙述方式。文学上的“天马行空”是值得赞誉的,但同时也要寻找与内容最为贴切吻合的表现形式。“天马行空”的文学作品同时也应该是“天衣无缝”的文本,以这一最高境界来要求的话,《哀牢深处》仍有提升的空间。